

萬里烽火入越南

陳冠南

漢口報到接受考驗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復員後，我正在南京市玄武門小學校擔任教職。三十七年六月下旬，接奉國防部第二廳電訊總臺命令，核派我到漢口工作隊服務，當時以萬分高興的心情受命這份差事。旋即摒擋一切，搭乘國營招商局江泰輪前往漢口報到。

南京到漢口航程約需三天時間，長江的水流，除上游宜昌到重慶三峽一段流速湍急外，中下游水流穩定，平穩地渡過了三天二夜的航程，到達了漢口。輪船停泊在江漢關碼頭，登岸後渡江先去武昌，會晤我的表弟李君潔華，他在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工程處武成段工作，當天便下榻在表弟處，翌日再渡江回漢口報到。漢口工作隊隊部設在郊區三元里，離市區有十多華里之遙，華中長官公署駐地亦在此。

到達部隊報到後，彷彿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，一切工作從頭學習，準備接受考驗。

記得到隊工作還不到三個月，國防部電訊總臺電令部隊派員接收××通訊器材庫四輛GMC

二輛半通訊車裝運至廣州總臺（是時總臺已由南京撤至廣州）。當時我的職務是最起碼的軍委三階事務官，隊長便令我負責辦理這一接收裝運的任務。

三十七年九、十月間，攸關戡亂戰爭成敗的徐蚌大會戰，正在激烈展開；華中地區戰局十分緊張，軍運頻繁。當時要將這四輛龐大的通訊車，由漢口渡江至武昌徐家棚車站，循粵漢路轉運至廣州，確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，任務艱鉅，可以想見。然而責任既然落在肩頭，也祇有肩負擔當，努力以赴去達成任務。當時的情形，我可說是一無憑藉、二無工作經驗，幸賴年輕有幹勁，克服了許多困難；終於在半個月內，安全轉運至廣州，圓滿達成上級交付的任務。

戰局逆轉撤往桂林

三十八年七月，戡亂戰局逆轉，武漢地區各軍事機關均作撤退準備，廣州總臺方面已有命令，要隊部先派遣部分人員南撤廣西桂林展開工作。

這一撤退任務，終又落在我的肩上，我接奉

命令後，隨即準備撤退工作。因我已有上次接收通訊車運往廣州的經驗，自信可以達成這項撤退任務，因此並不感到緊張、恐慌。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，先遣人員及電臺重要機器，在十月下旬循粵漢鐵路至湖南衡陽，再轉湘桂黔鐵路，人機安全撤退至廣西桂林。

甫抵桂林，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便是覓定辦公房舍，然後架設電臺機器，未料桂林地方電力不足，電壓偏低，不能架設機器，無法展開工作。於是我即將此情況向隊部報告，旋奉隊長指示我們這一批先遣人員留守桂林待命。至十一月初武漢外圍戰事吃緊，隊部亦終於十一月中旬撤退至柳州。

全隊人員柳州失散

隊部南撤柳州後，留守桂林待命的先遣人員，隨即向隊部歸建，此時華中戰局急遽變化。武漢地區國軍已經撤守，共軍部隊節節進逼，衡陽、桂林情勢危殆；柳州情況亦告緊急。隊部奉到總臺電令從速轉進海南島，在軍情緊急之頃，必須採取緊急撤退的行動。

當時隊部交通工具祇有軍用大卡車一輛，只能裝載少數重要機器，但全隊官兵一百餘人，卻無車輛載運，經隊長楊正南上校臨時裁決，要全體官兵慷慨解囊，湊集四百銀元，向柳州公路局租用最後一輛客車，載運人員撤離柳州。

在柳邕公路上（柳州至南寧），撤退的車輛人羣，蜿蜒有二十餘里，人車爭道，秩序紊亂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句話真的應驗了。我們裝運電臺機器的大卡車駕駛兵，大概是過分緊張，當車子駛出柳州市區，一個急轉彎轉向往南寧公路行駛時，不慎將一個荷槍實彈，維持紊亂秩序的民衆自衛隊士兵撞倒，後車輪碾壓其大腿，其他士兵見狀，即湧上卡車，將駕駛兵拖下車扣留。

當時我與隊長及部份同仁都在這輛車上，目睹突發意外事故，均感應變無力；駕駛兵被扣留，車子不能行駛，眼望着這一車經過千辛萬苦，由漢口撤運出來的國家重要物資，全部丟棄在柳邕道上，真有望車興嘆，徒喚奈何之感！

在後有追兵，時緊勢危的關頭，已不容我們再事片刻的逗留，於是大家各自分頭搶搭其他帶黃魚的車輛（註：所謂黃魚即便帶乘客上車），向南寧撤走。至此，我們全隊人員在撤離柳州時即告失散。

南寧陷落吳村歇腳

柳州至南寧中途，必須經過一道遷江，遷江俗名紅河，河面幅度不過一百五十公尺左右，惟水深流速，平時以渡船通行。戰時軍情緊急，臨

時用汽油桶連接起來架設浮橋，以供人車物資渡河。

我所搭乘之汽車，在距離遷江尚有四、五公里之遙即無法前進，因前面數以千計的車輛大排長龍，等候渡江。處此情況不得不下車徒步行至遷江口，渡過遷江南岸，隨着大批人羣，迅速以急行軍向南寧疾進，到達南寧大約是在十二月四日中午時刻。

甫入市區，祇見商店雙扉緊閉，景象蕭條，共黨人民解放軍的佈告，已在街頭出現。我即刻意識到南寧局勢已危在旦夕，當即於是日下午三時許，渡過以汽油桶架設的遷江浮橋，隨着大批部隊與人羣向西撤走。離南寧約六十華里的吳村圩，是邕欽與邕鎮公路的交叉點，北通南寧，南至廣東境內之欽州，西至鎮南關。在行進途中，回首遙望，祇見南寧市區火光燭天，想像南寧於是日晚間陷落。我到達了吳村圩已是夜半時刻，實因連日奔波，筋疲力盡，就在吳村圩歇腳休息。

在此時刻通過吳村圩之部隊以及隨軍撤退的難民，大約有十餘萬人，如蜂屯蟻湧一般，朝向南下欽州的公路上擠去，當時我想如果隨着這批大部隊撤去欽州，可能是凶多吉少，因這批雜色部隊與大批難民，集中欽州灣一隅之地，即使有足够的船隻擔任轉運至榆林港，在時間上恐也來不及，一旦敵軍突襲，無指揮系統之部隊，亦難與敵軍應戰，退則背臨大海，必將陷入絕境，束手待俘。所以我決定在吳村圩休息一晚再作打算。次日上午始跟隨黃杰將軍所率領的第一兵團

向西撤走。

加入黃杰兵團西撤

事後證實，南下欽州的部隊被敵軍截擊，全部覆沒，欽州亦被敵軍攻陷。吳村圩交岔路口何去何從，可說是決定我生死命運最重要的關鍵時刻。

在吳村圩隨第一兵團向西撤退，我始終緊隨着部隊行動，當時第一兵團司令官黃杰將軍原擬率部西進入滇；由於十二月九日，黃將軍得到昆明盧漢叛變的報導，至此入滇之道已絕，在前無去路，後有敵軍進逼之緊急情況下，必須在這最後關鍵時刻作最後的決定。

黃將軍乃召集了兵團高級指揮官與高級幕僚舉行緊急會議，針對當面敵情作審慎研究；會議中大家認為：昆明政變，前進之路已斷絕。轉入左右江地區，從事敵後游擊，地形上雖為有利，但部隊連續轉戰，未經整補，同時在化整為零，集零為整的游擊戰術原則之下，以邊區民衆的生活情形特殊，不易得到支持與掩護；而糧彈一項，尤為重要困難無法解決的問題。為保存華中區這一僅存的國家作戰力量，一致主張「假道入越，轉運臺灣」。

富國島度過三年半

最後經黃杰將軍裁定了這一方案，終於在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，隨着黃將軍所統率的第一兵團，揮離離開了可愛的祖國，進入異邦國土的越南。

當部隊繳械進入越南後，法國人因懼於共黨的恫嚇威脅（越南當時尚為法國殖民地），竟不講信義違背「假道入越，轉運臺灣」的協定，按國際公法，把我們這批進入越南三萬多人的國軍，全部集中在富國島軟禁起來。我們的行動失去了自由，法國人又嚴密封鎖我們對外通訊，對自由祖國臺灣的一般情況，無法瞭解。

直到三十九年雙十國慶過後，先總統蔣公特派專使林蔚文將軍來越宣慰，使我們重沐領袖溫

情，頓然感覺到家庭溫暖的可愛，有國家庇護的可貴。

重返臺灣自由祖國

四十年四月間，我在越南富國島寫信與臺灣連絡，向我的長官魏大銘將軍報告，漢口工作隊全體工作同志撤退的經過情形，同時說明了只有我個人幸運隨軍轉進越南，其餘同志不能及時撤出，均身陷大陸。至六月上旬，欣獲魏將軍來自

臺灣的覆信，告訴我政府屢與法方交涉，對留越國軍預計遲早必返回臺灣，囑我在留越期間，多加鍛鍊，充實自己，備為國用。溫情慰勉，益勵忠貞。

我入越國軍，瀛留海外三年又六月，經政府循外交途徑，不斷與法國政府折衝交涉，終於在四十二年七月，返回自由祖國復興基地臺灣的懷抱，重新為反共戰鬪貢獻出我們的智慧和力量來報效國家。

「紅朝緋聞」讀後

褚問鵬

讀中外雜誌第二〇八期姜安妮女士「紅朝緋聞」生動活潑，內容甚佳，人物也多。第三十五頁標題「龔家姊妹花上賊船」，有關周恩來、鄧穎超的事，說鄧穎超在抗日戰爭期間，一直住在延安窯洞內，恐與事實不符。

抗戰八年，有六年之久，筆者都在武漢及重慶工作。軍事委員會成立，奉派擔任軍委會上校秘書。因為要帶領軍委會的女生，所以在事實上，與軍委會政治部陳誠部長的夫人，幾乎每天都需見面；而戰時生活清苦，沒錢坐人力車（尚無公共汽車），來往全靠步行，美其名為「十一號汽車」。幸而我住在純陽洞的十八軍辦事處，交通尚稱方便。很有趣的是：曾家岩這條路，政治部陳部長（名誠，號辭修）攜眷住進了求精中學；出門不遠，就是戴笠（

字雨農）的公館；再過去，即為政治部副部長之一的周恩來與其妻鄧穎超的雙棲之所。為了部分本黨（國民黨）同志，很想把周恩來夫婦拉過來，所以筆者奉命與鄧穎超接近。但共產

黨一向沒有人情味，鄧穎超精明強幹，能言善辯，死的也會說成活的，豈是我這書呆子所能搖動分毫的？恰值周副部長恩來墜馬傷臂，要去莫斯科療傷，鄧穎超特來向陳夫人辭行。陳夫人命我往送。我深知共黨作風，不先取得同意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居所的，便送到半路，道聲珍重而別。歸報陳夫人，陳夫人亦以為然。忘記是過了兩個月？或是三個月？周、鄧又回到重慶來了。鄧穎超特來看望陳夫人，談了幾句周恩來傷勢已復元的話。陳夫人無話找話向鄧穎超隨便問問：

「聽說莫斯科的古蹟很多，你們有沒有去逛逛？」鄧穎超回答：「我一直在醫院裏陪侍周先生，那兒也沒有去！」鄧穎超那種緊張的神情態度，大約和答覆法庭問口供也不過如此吧？

我微微看了陳夫人一眼，陳夫人會意，知道和共產黨人說話很不容易，他們做賊心虛，總懷疑別人在探訊她的行蹤，所以如此緊張。稍坐，鄧即起身告辭，陳夫人也不留。但是從此之後，我的肩上輕鬆多了，因為再沒有人命我去拉攏鄧穎超了。

直到政治部改組，部長換了張治中，三位副部長也都換了人。筆者也隨陳夫人到了恩施，關於周、鄧的消息，就無所知了。總之我曾重慶見到過鄧穎超幾面，她當然也會回到延安過，但絕不是一直住在延安。